

## 《艰难时世》与《劳苦世界》： 从“诗”到“史”的演变

柯彦玢

**内容提要：**结构严谨、语言精炼是《艰难时世》最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对早期西方评论家们而言是缺点，对伍光建而言却是优点。不论是缺点还是优点，他们都不太了解这种结构和语言背后的东西。《艰难时世》是一个以完整的意象系统构筑起来的象征主义作品，它以诗意的象征对抗功利主义的“事实”哲学，关键意象的使用、重复与叠加有效地表达了作者对维多利亚文明的种种非人性现象的失望与关切。《劳苦世界》以传统中国白话小说为模板节译《艰难时世》，留取主要故事和人物，却省去了大部分意象，把“诗”译成了“史”。对《劳苦世界》的细读，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原著的象征性意象系统，全面了解它的布局与功用。

**关键词：**狄更斯 《艰难时世》 《劳苦世界》 意象系统 象征 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3)04-0036-09

《劳苦世界》是《艰难时世》(*Hard Times*)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以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为模板制作的节译本。伍光建之所以看上这部小说是因为它“重天理人情”，“部署结构。无不先有成竹在胸。”(迭更斯：译者序)。也就是说，他选择这部作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形式规整，布局巧妙，文字精炼；二是注重道德，关注天理人心。这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特点不谋而合。所以，伍光建的译本采用了章回小说的体式，主要留取原著的故事情节与人物，使译本读起来更真实生动。把寓意深刻的原著通俗化迎合了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

有利于译本在接受与普及，但是这样的处理使译本与原著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差异，译本把原著的“诗”变成了“史”。

《艰难时世》是一部象征性极强的文学作品，其完整的意象系统、象征性的人物和话语使得这部作品不仅不同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也不同于英国传统小说。象征与意象赋予了这部小说“诗”的特性。伍光建把“诗”译成“史”是完全忽略了原著的象征性意象系统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只注重现实而忽视狄更斯作品诗意的一面就会把‘诗’降低到‘史’的水平，不能挖掘作品的全部深度和欣赏作品的整体。”(蔡明水：

37) 原著的意象和象征都是针对害人害己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消除了意象和象征,也就意味着减弱了对功利主义的嘲讽和批判。通过原著与译本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原著众多的意象是以怎样的方式构建一个象征体系的,而对于这个体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明辨象征与写实的差异。

#### 《艰难时世》:诗意的象征

西方学者对《艰难时世》的象征艺术的认识——从最初的不理解到后来的肯定——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因为不合评论家们的趣味,从出版之日起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小说一直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它是被读得最少的一本小说”,“干巴巴的、让人晕头转向”。(House: 203—04)“干巴巴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不真实”,对话、人物描写和生活都不真实,因为他对工人、工厂、工业城镇不了解。(Gissing: 356)有人断定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不是他的上乘之作,因为它过于夸张。罗斯金(John Ruskin)说,夸张只能用于娱乐性作品,对《艰难时世》这样严肃的作品,应该采用更严苛、更准确的分析。(355)李维斯(F. R. Leavis)认为,《艰难时世》不受读者欢迎的原因并不只限于精炼的语言和严谨的结构,这与当时人们的欣赏习惯有关。(1973: 187)对当时的读者而言,真实是第一要义,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但是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艰难时世》并不合适,与其说这部小说不反映现实,不如说狄更斯反映现实的方式与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维勒(Michael Wheeler)在比较中发现,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前几章的现实主义手法像早期的摄影术,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则更像是一幅色彩浓重的怪诞的油画。(62)

《艰难时世》大量采用隐喻、象征的手法,以高度精炼的语言表现现实社会精神的迷失,是一部表达深刻思想的作品。直到后来象征主义文学形成了一个流派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它的文学价值。“他们开始发觉狄更斯是极富于象征手法的。这种技术是理性的或者说在审美上是先进的,从而它使得狄更斯卓尔不群。”(燕卜苏: 264)论者指出,狄更斯“在小说中引爆了诗的传统”,像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人一样,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抗击一个分化解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林赛: 177—78)可见《艰难时世》的思想价值源于它的艺术价值,当它的艺术价值得不到认可的时候,它的思想价值自然也得不到认可。

狄更斯对工业化城市和现代社会的反应与象征主义诗人基本相同,他有着伟大作家的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使他能有意无意中写出不为常人所理解的作品来。《艰难时世》是以想象反击事实的小说,因此它绝对不会以描述“事实”的面目现身,相反,它要以精炼的手法揭示科学与物质繁荣背后所潜藏的精神危机。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不是像狄更斯之前的那些大作家们所描绘的现实——社会现实和人物内心的现实,而是一些看起来不真实却更接近人性、拷问灵魂的东西。在评论象征主义诗人维利耶时,西蒙斯(Arthur Symons)说:

正是出于某种极端的愤怒,他攻击人世间各种追求功利的力量:科学、进步、为世人所看重的“事实”,以及“积极的”、“严肃的”、“体面的”事情。讽刺,对他而言,是美对丑的报复,是美对丑的迫害;它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讽刺,它是一个相信精神世界的人对物质世界的讽刺。(48)

其实,这句话用于评判《艰难时世》是

再贴切不过的。《艰难时世》所采用的象征和意象是带有预言性质的,维勒指出:“在《艰难时世》(狄更斯最具预言风格的小说)中,火和灰的意象让人觉得死亡无时无刻不徘徊在焦炭市这个地狱里。由于作者公开对着先前‘隐含’的读者说话,小说的结尾也包含了狄更斯对现代‘文明’的看法。”(62)

象征在文学中的应用古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狄更斯在这样一部短短的作品中有目的地、系统地、大量地使用象征手法,我们可以断定他是现代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虽然他本人没有打出象征主义的旗帜,他在《艰难时世》中的艺术表现与成就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狄更斯对功利社会的极端愤怒只能用象征主义的讽刺来表达,这与象征主义诗人是不谋而合的。西蒙斯认为象征主义艺术是维利耶创造的,(57)其实小说的象征主义艺术在狄更斯和奈瓦尔的作品中已经存在,它们都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而维利耶直到1886年才为世人所识。因此我们可以说象征主义在作为一个文艺运动之前就已经作为一种需要、一种表达人对精神荒原不满的有效手段而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了。

自李维斯力排众议肯定《艰难时世》的艺术成就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了狄更斯的意象与象征的研究。李维斯认为《艰难时世》是一部极富诗意的作品,“以它的结构、富于想象力的方式、象征主义的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文笔的精练,《艰难时世》让我们感觉在形式上与诗作相近。”<sup>①</sup>(1966:346)他还指出,作为“寓言”性的作品,《艰难时世》具有贯穿始终的意图,所有的意象都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服务。(1973:188)李维斯对这部作品的分析和总体评价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1963年,斯通(Harry Stone)撰文分析《董贝父子》(1846—1848)中音乐—梯子的意象,发现在写《董贝父子》之前,也就是1843到1846年间,狄更斯经历了一个艺术上的飞跃,即把“童话故事中的重复和咒语精心编制成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象征性的主题意象”,这种模式影响到他后来所有的作品。(217)这个研究虽然不是直接与《艰难时世》相关,但是为研究《艰难时世》的意象系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个相关的理论研究是《狄更斯的叙述艺术》,该书分析了爱伦·坡的“效果的整一”(unity of effect)及爱德华·曼金的“效果的强烈”(intensity of effect)对狄更斯1846年之后作品的影响。在坡看来,狄更斯是善于制造整一效果的作家,但他在《巴纳比·拉奇》中没能做到这一点。坡认为:“一个智慧的文学艺术家不是以事件容纳思想,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设计一个独特的单一的效果,然后虚构出相应的事件——而后他把这些事件拼接起来,以最佳的状态服务于事先构想的效果。”(Sucksmith:71)坡的观点是艺术效果的设计比事件的真实更重要,他与狄更斯就“效果的整一”技巧做过深入的交流,对其在后来有意识地设计作品的整一效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曼金提出,作家应选取能引发其想象力的景物或物体,因为对这些东西的描写更符合他的目的。(Sucksmith:75)这个观点要求作家对自然界的事物剪裁取舍,以集中的效应反映作者的思想。坡和曼金的思想——尤其是坡,因为他本人就是象征主义作家——对狄更斯作品中象征性意象集中表现主题的艺术特征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sup>①</sup> 李维斯是最早关注《艰难时世》象征艺术的评论家,他的《伟大的传统》出版于1948年。

1967年,塞尔(Jerome Thale)在研究狄更斯的想象力时声称,狄更斯采用更多的象征描写不是简单地朝着象征主义转变,而是为了使作品的思想更连贯、对社会的批评更尖锐。但同时他也指出,除了《艰难时世》和《小杜丽》,狄更斯其他小说里的象征主题总是用一阵子就丢了,没能贯彻作品的始终。(139;143)1969年,桑斯特洛姆(David Sonstroem)撰文研究比较了《艰难时世》中有生命的意象(鲜花、马、阳光、火等)和无生命的意象(葛擂硬—grind、班特比—bound、马金初—choke、饥饿意象、矿坑、深坑以及一切无生命的东西),他相信这表明狄更斯用这些意象把整部作品连成了一个富于想象的整体,说明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520—29)另一篇研究意象系统的文章发表于1971年,该文指出现代学者从未系统地探索过《艰难时世》的意象,因此从三个层面(社会经济层面、教育和个人层面及宗教层面)研究该小说的田野和花园意象。(Bornstein;158—170)1979年,维勒在他的《维多利亚小说中引喻的艺术》中谈到,《艰难时世》中火与灰的意象让人想到世界末日的景象。(62)关于《艰难时世》的意象,我们还可以从《狄更斯作品中的比喻》一书中找到,该书谈到了司提芬与石屋的对立、人物名字的寓意(如 Slackbridge-No thoroughfare)以及景物的寓意(如 chimney-towers of Babel)等等。(Vogel;63—64)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们才开始注重狄更斯小说意象与象征的研究。1985年,蔡明水的《狄更斯的象征手法初探》对狄更斯的象征手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指出:“狄更斯世界中的万物似乎有灵性是因为他善于运用诗人惯用的拟人、象征和诗的意象体系,并凭借想象力‘把一切合为优美而机智的整体’,构成一

个气象万千的艺术世界。”(36)蔡明水对狄更斯象征主义艺术的研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狄更斯小说的社会现实层面转移到艺术层面,让我们开始关注狄更斯小说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蔡明水的文章提到了《艰难时世》中无穷无尽的长蛇似的浓烟和忧郁的大象,以及两个世界(扼杀人性、毫无生机的资产阶级世界和富有浪漫情调的自由王国)的对比,但没有对该小说的意象和象征做全面深入的分析。2000年,傅云霞的《狄更斯象征艺术的诗化效果》认为,《艰难时世》的象征属于用神话来“表现普遍真理,对腐败的社会进行抨击。象征赋予了《艰难时世》更深邃、更广阔的蕴意”。(75)2001年,罗经国的《狄更斯的创作》阐述了《艰难时世》的象征艺术手法。(112—13)他也提到了浓烟和大象,还谈及人物的外貌特征和习惯性动作等等,但和蔡明水一样,他的评论是概括性的。2004年,陈晓兰的《腐朽之力: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探讨了狄更斯小说中工业化影响下的都市废墟形象。她注意到狄更斯在《艰难时世》这部工业小说里没有描写生产过程,而是描绘臭气熏天的紫色河流和被煤烟染黑的焦炭市,在狄更斯笔下都市是“被利用、破坏、被消耗后的废墟荒原”,废墟与繁荣纠缠在一起。(137)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作品整体效果的强调,以及他们对意象系统的研究,应该说比国内学者相关的研究视野更宽广深入一些。西方学者在理论上探讨了《艰难时世》意象的系统性与作品的整体效果的问题,但对作品的分析倾向于把重点放在人物或某些对立的意象上,不够全面。《艰难时世》的意象是成体系的,不是零散随意的,而《劳苦世界》对这个体系的消解让我们看到了前人未关注到的一些现象,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

审视原著的象征性意象系统,从译本意象的缺失中发现意象系统的作用及其预设的整体效果。

#### 《劳苦世界》:于象征外求真实

原著中意象的呈现有多种方式,有直接呈现物件的:如矿井、贫民区的梯子;有使用明喻的,如海、蛇、蚂蚁、童话中的宫殿、蓝胡子、透明体;还有使用暗喻的,如大象、斯奶奶的梯子、鹰(鸟嘴、爪子)等;有些意象既用明喻又用暗喻。不论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些意象主要用于描绘和象征,使作品的语言更具想象力与张力。原著中的意象是反复出现的,犹如音乐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段落,若干主题作为结构与发展的基本要素表现作品的思想。它们是一个系统,在重复与变奏中不断加深印象,给人以感官和精神上的冲击。《劳苦世界》保留了蛇、蚂蚁、斯奶奶的梯子等意象,省略了大象、海、童话中的宫殿、蓝胡子等意象,其他如鹰等则时有时无,随意性较大。

原著中有七处关于海的比喻,《劳苦世界》在译文中没有体现,如以下两例:

1, to still the thundering sea, waited until there was a profound silence.

意思是要众人不要吵。等到台下很肃静。(129)

2, as a remarkable man, and a self-made man, and a commercial wonder more admirable than Venus, who had risen out of the mud instead of the sea, he liked to show how little his domestic affairs abated his business ardor.

他自以为是一个非常人。要把他怎样的精明敏捷夸示于人。他不把家事当作什么大事。仍然是对于商业上振刷精神。(233)

在前一个例子中隐喻变成了非隐喻,在后一个例子中比喻被省略了。隐喻在原著中不只是一个修辞的手段,它是有意义的。“喧闹的大海”译成“吵”,在意思上差了许多。“喧闹的大海”表明听众不赞同斯拉布瑞其的说法,激烈地反对他,而我们从“吵”这个字里看不出这种激烈的场面。在《艰难时世》里,作者极力要说明的是,斯拉布瑞其之流的人不能代表工人及工人的利益,工人们后来之所以听他的是被他给蛊惑了。在这个句子中,“喧闹的大海”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比喻,它表明了工人与斯拉布瑞其在本质上的区别:斯拉布瑞其是极端、偏激的,而大多数工人是公道的。第二例中作者把班特比先生与维纳斯<sup>①</sup>相比是辛辣的讽刺,班特比不承认母亲的养育之恩,甚至抹煞她的存在,他靠个人奋斗成功的故事与维纳斯的出身相似,不是出自人母而是从污泥中冒出来的。从译文看,班特比顶多是个不孝的疯子,而从原著看,班特比不只是不孝,他这个专讲事实的人在撒弥天大谎。如果他的经历真如他所说的,他要么肯定活不下来,要么就是像维纳斯那样的神,生命力超强。

在《劳苦世界》里,蓝胡子<sup>②</sup>与透明体的意象都略去不译。仅有的两处提到透明体的文字一段根本没译,一段只是概括了大意(15; 86; 187)《艰难时世》中蓝胡子与透明体的意象与加拉太太有关,也是隐喻。这两个意象紧密相关,尽管出现的频率不高,却是构成小说主题的重要因素。加拉

<sup>①</sup> 维纳斯是克洛诺斯把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的肢体投入海里时从泡沫中诞生出来的。

<sup>②</sup> 蓝胡子是17世纪法国作家查尔斯·贝鲁特笔下的人物。蓝胡子娶过多个妻子,但把她们一个个都杀了,放在一个房间里。他的罪行被他最后一个妻子发现了,她的兄弟杀了他。加拉虽然没有杀妻,却把妻子弄得痛苦不堪、疾病缠身,最后郁郁而死。作者说加拉与蓝胡子并不相像,却又特意提及蓝胡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与思考的空间。

太太在小说中所占分量不大，形象也很微弱，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才更具重要性。加拉太太的弱是与加拉先生以及整个事实世界的强相对应的。强悍的压倒一切的事实世界里没有加拉太太的位置，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不是事实的东西、阴柔的东西、与感情有关的东西、不能立竿见影有成效的东西统统都被视为无用的，应该鄙弃。功利主义只注重看得见的实利，轻视感情，轻视家庭生活，以为得到了实利就得到了一切。加拉先生虽然长得像蓝胡子，也没动手杀妻，但他最终还是跟蓝胡子一样要了他妻子的命。书房里蓝色的书暗示着加拉先生杀人用的是写在书本里的事实/思想，而不是用刀枪绳索。没有了蓝胡子和透明体的意象，伍译中所有关于加拉夫人的故事就得不到提升，只能停留在场景与事件的层面，读者对故事的印象就不深，无法真正了解功利主义害人害己的本质。

小说中的黑梯子总共出现过三回，第一次出现在司提芬与勒奇告别时的街景描写；第二次是描述司提芬的房间；第三次是司提芬回到家见到黑梯子后，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这三回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渐次发展的。作者前两次提到黑梯子是司提芬的思考做铺垫。满身龌龊、烂醉如泥的妻子的归来，让司提芬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绝望。在送勒奇回家时，他看到了黑梯子。他自家的屋子里也曾死过几个房客，窗台上那朦胧微弱的烛光给人一种生命脆弱、死神随时可能降临的暗示，这使他生发了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的感慨。如果没有前面黑梯子意象的铺垫，最后一段中关于死的不公平的感慨就颇为突兀，我们很难明白“窗台上暗暗的有烛光”怎么会勾起他的感慨。黑梯子—勒奇—妻子—死，这是司提芬此刻内心挣扎的写照，没有梯子，这一连串的思虑就没有头绪。黑梯子

的意象将司提芬的痛苦、之后他看到妻子拿起药瓶时的复杂心情，以及最后对勒奇的皈依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是一般的穷人，在绝望中杀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对司提芬来说这只是一个心路历程。黑梯子的意象首先在司提芬的脑子里不断闪现，然后又反映到读者的脑海里，变成一个可以在故事之外独立存在的经典画面。没有这个意象，译文里的这一段故事就只能凌乱事件的叠加，构不成一个有意义的叙述段落来表现一个与众不同的圣人般的司提芬。

从焦炭市到班特比别墅之间的无数“过去和现在的煤矿井”不仅与司提芬有关，更是涉及到路伊沙的命运。司提芬最后死在一座废弃的煤矿井中，这既是偶然，也是宿命。焦炭市周围满是矿井，走多了、尤其是走夜路，就可能落入其中的一个。司提芬一次又一次地被逼入绝境，最后的结局十有八九是个死。相比之下，司提芬失足落入的矿井是实在的矿井，是具体的，而威胁路伊沙的矿井是象征性的，在文本中多次重复，像一张张黑洞洞的大口，随时准备吞噬路伊沙。原著至少有四处提到矿井(128、149、149、158)，但《劳苦世界》都省译了。班特比及一干人等，带着路伊沙乘火车跨越架在无数过去和现在的煤矿井上的拱桥，来来去去。毕周像小鬼，斯奶奶像猎鹰，在阴森森的井口上游走。矿井张开的大口，是给路伊沙们设下的陷阱，是她的人生路上要面临的精神磨难。

路伊沙最大的敌人是斯奶奶，后者在路伊沙未嫁之前在班特比家以女主人自居，巴望着有朝一日由管家晋升为班特比太太。路伊沙的入住打碎了她的如意算盘，她从此怀恨在心，想方设法毁掉班特比的婚姻。发现哈特厚的动机之后，斯奶奶就开始在一旁观察，为路伊沙摆下一个大

梯子,冷冷地看着她一天天往下走。同时,她又像猎鹰一样盘旋守候,准备在路伊沙跌到底的时候抓住她,把她撕碎吃了。原著中与大楼梯和鹰的意象有关的段落出现了六次(146、147、154、155、156、158—159),伍光建照译了“鹰”这个字眼和概念,却忽略了斯奶奶如鹰般的形象描写。第四次与第二次斯奶奶挥动或转动鹰爪般的手的动作没有出现在译文里:“对着往下走的那个人,挥动她右手的连指手套(手套里的拳头是紧握的)”、“让她的两只连指手套交叉着,慢慢地来回磨擦”。<sup>①</sup>第一次原文大部分是描写斯奶奶的鹰形外表,字里行间充满了讽刺:如此一个高贵的夫人如鹰般敏捷,不声不响地蹑上溜下,做着不高贵的勾当。译文只道斯奶奶用心观察,神态从容,把她刻画成一个善于伪装、精明能干的寻常女子,而不是一只神出鬼没、机敏矫捷的猎鹰。(181)第六次是描写斯奶奶跟踪路伊沙和哈特厚的情形,原文里斯奶奶的行为举止以及心态完全与鹰无二,有鹰的感觉和知觉,有鹰的动作,堪比一只真正的猎鹰。译文把这些鹰的意象与描写省略之后,读者还是知道斯奶奶在长相与性格方面像鹰,但不知如何像;(196)而在原著中斯奶奶就是鹰,她是善变的,时而以鹰的面目上下翻飞,时而像贵妇般端庄文雅。

原著中大楼梯的意象常常跟鹰的意象同时出现,而这个意象在译文中也是不完整的。在第四次出现鹰的形象的时候,原文关于楼梯的一段(155)侧重于斯奶奶的动机与盘算,不像译文所说的斯奶奶只是耐心地等着路伊沙向下溜。她不仅看,她还满心巴望着路伊沙快点溜下去,让梯子砸在她身上,叫她万劫不复。梯子不仅供人攀爬,还用来砸人。这楼梯是斯奶奶搭在心里的一座建筑,等路伊沙到底的时候,她要让她倾覆,镇压路伊沙,颇有点像把白

娘子镇在雷峰塔下的感觉。原文第五次出现楼梯和鹰意象的地方是“越走越低”那一章的开头部分,(156)这部分自然跟楼梯有关,可是译文却直接从第二段加拉先生回家译起,没译第一段,因而忽略了该章的主题。(192)其实加拉先生回家处理丧事这段才是插曲,作者想告诉读者的是,加拉先生只管忙公事,对儿女家人漠不关心。此刻的路伊沙像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孤苦无依,只能靠自己内心或者冥冥中的某种力量摆脱困境。此处楼梯的意象起衔接、强调作用,引着读者抓着巨大的悬念往下读,看看路伊沙最终到底掉下去没有。楼梯的意象也是在不断的重复中为斯奶奶织起一张大网,最后又让这张网落空。译文对意象呈现得不完整,使得它们看似随意安排的。值得注意的是,大楼梯的意象如果堆积的不够厚,最后崩盘的效果就不够显著。

小说中最后一组同样重要却被译文略去的意象,是工厂那童话般亮堂的宫殿和大象的动作。宫殿是原著中的一个核心意象,是工业社会的中心、社会繁荣的象征、各种问题的源头。“童话般的宫殿”这个说法使上述提到的大部分意象形成了一个体系,那就是“童话”。这个童话的主人公是路伊沙,中心是宫殿/工厂,在通往班特比别墅/家的路上处处是陷阱,宫殿的四周到处是黑色的毒雾、污水、单调重复的劳作和死亡;宫殿的主人以功利论成败,不把工人当人,蔑视人的感情和想象力,只以事实为真理,不管这些事实是否经得起推敲,也不管事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破落贵族们一个引诱路伊沙,把她往深坑里带;一个四处

<sup>①</sup> 原文分别是: shook her right mitten (with her fist in it), at the figure coming down; causing her mittens slowly to revolve over one another.

追踪侦查,摆好梯子等着路伊沙堕落。家里(夫家和娘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宫殿里只有冷漠的事实,路上到处是陷阱。历尽艰险的路伊沙回到娘家时,发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父亲的事实教育的牺牲品。宫殿本应是富丽堂皇、温馨舒适的地方,但是在狄更斯看来,工厂只是外表看起来像宫殿,而实际上是个释放毒气的闷热箱子,对外污染环境,对内伤害工人。《劳苦世界》省译的三处宫殿的意象(52、56、86)恰恰把这个核心意象删除了,使读者失去了将路伊沙与童话联系起来的可能。

与宫殿意象紧密相连的是大象的意象,这个意象在原著中五次出现。(20—21、56、63、86、191)第一次是明喻,把蒸汽机的活塞比作大象的头,大象处于阴郁疯狂的状态。第二次就变成了暗喻,固执、机械的大象在单调地干着重活。不论是什么天气、发生什么事,大象都按时开工,工人也都要去干活。我们把这些句子串起来,就能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单调、辛苦、阴郁、疯狂。每个工作日只要这个大象开始工作,工人也开始工作。最后一句, the melancholy mad elephants, like the Hard Fact men, abated nothing of their set routine, whatever happened. (191)作者点明了大象跟那些只认事实的男人一样阴郁疯狂,或者说那些男人跟大象一样冷漠、固执、机械。大象是宫殿的一部分,它把机械的事实输入工厂,成为它的核心,让它主宰城市的生活。

《艰难时世》用上述提到的各种意象编织成的意象系统组成了一个寓意深刻的童话世界。小姑娘—路伊沙、可怜人—圣徒—司提芬、事实哲学家—加拉、透明体—加拉太太、鹰—斯奶奶、天使—勒奇、善良淳朴的人—西西/马戏团、小鬼—毕左尔、伪事实、冷酷的丈夫—班特比、事实—老婆

子、伪王子—哈特厚,所有这些人物构成了事实及其对立面的两个世界。他们的名字都各有特点,代表了他们的性格,如桑斯特洛姆提到的 grind、bound、choke 等,也与童话人物的名字相似。这些人物与人们日常所认识的现实和现实中的人相去甚远,但并非完全不同。狄更斯抓取现实中极具特点的景物,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它们,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点明它们的危害,表明自己对工业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及其模式的担忧,希望引发人们对这种发展模式的警惕和反思。

意象或隐喻的重复在修辞上是很有用的,象征性作品中的隐喻常常是重复出现的,与作品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有关。有学者告诫译者,不能把隐喻看成孤立的现象:“隐喻的重复出现有累积效应,累积效应意味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某种特殊的感受,而这正是译者想要捕捉到的东西。”(Hatim and Mason:4)隐喻的重复出现,除了表现工业社会的狰狞面目之外,还营造了一种童话故事的气氛,人与鬼、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空间的转换在瞬息间就能完成。

研究伍光建的省译和改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西方的批评家们觉得因为篇幅短狄更斯才写出这么不像样的小说的时候,译者却认为还可以把它删节得更短。西方的批评家感觉篇幅长一点才能更真实,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铺陈故事、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伍光建则断定只有删掉一些文字和比喻故事才更简练明快、更真实可信。二者都不能欣赏狄更斯的写作方式,因为它看起来不真实。其实用意象未必就不真实,意象也能反映现实生活,只是方式不同。狄更斯用意象和隐喻来造就一种“想象的理性”,(Lakoff and



Johnson: 53)而不是数字化、事实化的看似理性的不理性,也不是以情感人。他的象征性的比喻赋予了小说较大的阐释与想象空间,让作品更有思想深度。

《艰难时世》和《劳苦世界》之间在意象系统上的差异不仅显示出原作者和译者对“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出二者对文字功用的不同见解。小说的节译一般采用的都是留取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方法,但有些小说可以省译、删节,有些则不可以,能否省译要看原著所采用的艺术技巧和文体。《艰难时世》的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限制了译者的自由,原著大大小小的意象组成的意象网使得任何改动都会降低意象的累积效应。把一个“不真实”的象征主义作品改写得比较真实,对译者来说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去掉象征性意象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故事,《劳苦世界》呈现的故事和人物是否“真实”,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Bornstein, George. "Miscultivated Field and Co-rupted Garden: Imagery in *Hard Time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26. No. 2(Sep. 1971).
- Gissing, George. "Dickens and the Working Class." *Dickens; Hard Times, Great Expectations and Our Mutual Friend*. Ed. N. Page. London: Macmillan, 1979.
- Hatim, B., and I.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don: Longman, 1990.
- House, Humphrey. *The Dickens World*. London: Oxford UP, 1942.
- Kaplan, Fred, and Sylvère Monod, eds. *Hard Times: An Authoritative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01.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80.
- Leavis, F. R. "Hard Times: The World of Bentham." *Dickens: the Novelist*. By F. R. Leavis and Q. D. Leavi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 . "The Great Tradition." *Hard Times: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Sources, and Contemporary Reactions Criticism*. Ed. George Ford and Sylvère Monod. New York: Norton, 1966.
- Ruskin, John. "A Note on *Hard Times*." *Hard Times: An Authoritative Text, Contexts, Criticism*.
- Sonstroem, David. "Fettered Fancy in 'Hard Times'." *PMLA*. Vol. 84. No. 3(May 1969).
- Stone, Harry. "Dickens and Leitmotif: Music-Staircase Imagery in *Dombey and Son*." *College English*. Vol. 25. No. 3(Dec. 1963).
- Sucksmith, Harvey Peter. *The Narrative Art of Charles Dickens*. London: Oxford UP, 1970.
- Symons, Arthur.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1908.
- Thale, Jerome. "The Imagination of Charles Dickens: Some Preliminary Discrimination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Vol. 22. No. 2(Sep. 1967).
- Vogel, Jane. *Allegory in Dickens*. Alabama: The U of Alabama P, 1977.
- Wheeler, Michael. *The Art of Allusion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9.
- 蔡明水:《狄更斯的象征手法初探》,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 陈晓兰:《腐朽之力: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 迭更斯:《劳苦世界》,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 傅云霞:《狄更斯象征艺术的诗化效果》,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
- 林赛:《最后定评》,吴柱存译,载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 罗经国:《狄更斯的创作》。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 燕卜苏:《狄更斯的象征手法》,乔必译,载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北京 100871

That is to say, how literary soundscapes echo soundscapes in the natural world. So, in Nature writing, we see the multidimensional picture of landscape, soundscape, and soulscape.

**KE Yanbin *Hard Times* and *Lao Ku Shi Jie*: A Transformation from Poetic Work to Prosaic Story** 36

The concentration of structure and language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Hard Times*, which for the earlier critics of the book is a regrettable defect but an admirable strength for one of its Chinese translators Wu Guangjian. Be it a defect or strength, they are both misunderstandings. By the image system, *Hard Times* affects us as a symbolic poetic work which is constructed to criticize the hard philosophy of Utilitarianism. And with a cluster of key images, Dickens expresses his disappointment and concern with the inhumanities of Victorian civilization. By leaving out most of the images of the original to fit into the mode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 *Lao Ku Shi Jie* has transformed the poetic work into a prosaic story. A close study of this translation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esign and function of the symbolic image system of the original from a new perspective.

**LI Mingming A New Renaissance of German Dram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45

In the culture of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drama is so far difficult to be replaced by other genr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German drama in the 20th century, it is not only the realm to recollect history and culture but also the place for the spiritual being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 rest in; also, it once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propaganda for the state ideology, or promo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innovations. German drama bears the important task of enlightening and inspiring intellect and keeps in mind its essential role of entertainment as well.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 new renaissance of German drama was ushered in after its two-decade low ebb during the 70s and 80s. Aiming to review and illuminate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German drama during 1980-2000,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se the dynamic of the stage aesthetics and introduce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with the view to making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German drama studies in China.

**LUO Chen & WANG Lili The "Englishness" in the Man Booker Prize** 58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literary prizes in the world, the Man Booker Prize, founded in 1969,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the selected range, nationality, original nationality, ethnicity, gender and age of the prize winner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trong "Englishness" suggested by the prize and its ambition of culturally reconstructing the empire. Today, Britain has obtained the name "Cultural Superpower", on which we should keep an open eye.

**XU Zhiqiang Bulgakov's "Black Mas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ethe's *Faust*** 69

Mikhail Bulgakov's "black mass" reproduces Goethe's pattern of "Witches' Sabbath" in *Faust*. Although Dmitry Merezhkovsky and Valery Bryusov have also inherited this pattern, Bulgakov is by far the most prominent writer in terms of Goethe's impact under which the narrative scale is designed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His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oethe's tradition is also the most adequate. His "black mass" is a parody closely linked to the literary canon and manifests rich streaks of a personalized mythopoesis. Nearly all the traditional "carnival" elements are adopted in his work, while erotic elements are removed and rejected. In other words, the author has managed to contain crude and vulgar descriptions, and to achieve an apotheosis of the characters who would otherwise be devilish, thus infusing a noble quality into the traditional mode.